

普
华
经
管

普华经管学术文丛

图书馆转型研究

TU SHU GUAN
ZHUAN XING
YAN JIU

朱开忠◎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普华经管学术文丛

图书馆转型研究

朱开忠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转型研究 / 朱开忠著.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1.4

(普华经管学术文丛)

ISBN 978-7-115-25045-2

I. ①图… II. ①朱… III. ①图书馆工作—研究
IV. ①G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6963号

内容提要

本书以图书馆转型为视角,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了图书馆事业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再到现代图书馆的转型;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现代图书馆转型期的业务工作、读者服务工作以及管理工作;对数字图书馆的概念、特征、内容、功能等进行了解析。书中既有理论的铺陈,也有实践经验的总结。

本书广泛适于各类图书馆的主管和工作人员、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以及相关行业的培训、管理咨询人员阅读、使用。

普华经管学术文丛

图书馆转型研究

◆ 著 朱开忠

责任编辑 王莹舟

执行编辑 王楠楠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2.5

2011年4月第1版

字数: 160千字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115-25045-2

定 价: 28.00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 67129879 印装质量热线: (010) 67129223

反盗版热线: (010) 67171154

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的转型必然导致图书馆的转型，社会发展不断推动着图书馆的演变、转型和发展。

考察图书馆从产生到今天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把握其本质。对于图书馆的演变历程，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断定。有的学者将其分为藏书楼和图书馆两大阶段；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古代图书馆、近代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三个阶段；有的学者将其分为传统图书馆、现代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三个阶段；有的学者则将其分为传统图书馆时代、图书馆自动化时代和图书馆网络时代三个阶段。

我个人认为，从技术角度出发，图书馆演变历程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原始图书馆时代

图书馆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开始而出现的。人类社会最早的文献收藏活动中就有了图书馆的雏形，古埃及对纸草文献的收藏、古代中国对甲骨文献和简册文献的收藏便是明证。从社会形态上看，原始图书馆主要存在于奴隶社会，地点一般设在首都；收藏载体主要是甲骨、竹简、树皮等天然材料；工作内容以收藏为主，兼有初步的整理，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献就是按年代典藏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王宫贵族。相传老子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图书馆馆长。

第二个阶段——藏书楼时代

藏书楼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它已由王室集中办馆转变为分散办馆。在中国，大致可分为官府藏书、书院藏书、寺观藏书、私家藏书四个体系。其技术支持主要是造纸技术和印刷术；其收藏重点主要是纸本图书；其工作内容，除了收藏外，还有分类、编目、版本、考订等内容；其服务对象各不相同，但都是少数人。例如，官府藏书服务于统治者、书院藏书服务于本院的弟子、寺观藏书服务于僧道、私家藏书则服务于家族成员。

第三个阶段——开放式图书馆时代

第三代图书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在第二代图书馆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从时间上看，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图书馆纷纷从皇室、教堂里脱离出来而办成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思潮日渐兴起，1902年，浙江绍兴徐树兰仿照西方公共图书馆模式，创办了古越藏书楼并对外开放。1904年，湖南省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先后成立，这是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藏书机构。1912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1913年，安徽省立图书馆正式成立。自第三代图书馆起，图书馆已发展成为专门的社会事业，图书馆的类型更加多样化，如我国有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科学与专业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军事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等；电话、传真、摄影技术、录音技术、静电复印技术的应用增强了图书馆的服务能力；馆藏文献载体除了图书外，连续出版物（期刊、报纸等）和特种文献（专利文献、标准文献、会议文献、政府文献、产品文献、档案文献、学位论文、科技报告等）的比例越来越大，除纸本外，音像文献和缩微文献也开始受到关注；图书馆的工作内容涉及采访、分类、编目、流通、典藏、服务等各流程，其已逐步打破了在服务对象的社会地位、民族、宗教信仰、年龄、性别等方面的界限，而成为社会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场所。

第四个阶段——自动化图书馆时代

以1946年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为主要标志。我国自动化图书馆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在自动化时代，图书馆已发展成为社会的文献资源中心，图书馆事业网的建设逐步完善，图书情报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形成，计算机技术、光盘技术成为支持图书馆的重要技术。图书馆的自动化集成系统及光盘检索的应用使图书馆的各个环节“活”了起来，联机编目、联机检索的方式开始得以推广使用；磁盘、光盘等电子文献的不断丰富大大改变了图书馆馆藏文献的载体；其工作内容已开始重视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的编制、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以及信息服务工作和用户培训工作的开展；其服务对象已开始逐步冲破部门的限制，图书馆服务社会化、效益化的意识已经萌发。

第五个阶段——复合型图书馆时代

从时间上看，复合型图书馆时代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万维网

(World Wide Web)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问世后,迅速向社会大众普及。1994年,中国获准加入互联网。1995年,中国的普通百姓开始进入互联网。随着因特网投入商业运行,复合型图书馆应运而生。它既具有传统图书馆的元素,又具有数字图书馆的内容。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全球化、一体化已现端倪,真正的共知、共建、共享的互联图书馆系统的形成已成必然。各种最新的信息技术形成了对图书馆的强大技术支持,计算机技术、高密度存储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纳米技术等将使图书馆从自动化走向网络化、数字化和虚拟化。图书馆的馆藏扩展为现实馆藏和虚拟馆藏两大部分。其工作内容将把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重心;服务对象不但包括到馆读者,还包括有条件利用网络的用户,高速信息网延伸到哪里,图书馆用户就分布到哪里。

从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文字和文献是图书馆产生的前提,社会需求是图书馆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已成为判断图书馆发展阶段的重要参考。图书馆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由功能简单向功能复杂不断发展,每一个相对持续、稳定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支持技术、收藏重点、运作方式、服务对象和职能范围。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以计算机为主体的信息技术是图书馆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可以说,没有一系列的现代技术(计算机技术、高密度存储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等),就没有今天图书馆的转型和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的图书馆转型,是指图书馆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转变。从形式上来说,是由传统的纸质文献载体形态的图书馆体系向以数字资源和其他资源共存互补的复合图书馆体系的转变;从内容上来说,是建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信息资源的保障体系。图书馆转型以建立现代图书馆制度,推进图书馆制度创新,构建开放性、多层次、多规格、多样化、具有特色和活力的图书馆新体系为主要目的;以激发图书馆活力,调动广大图书馆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追求人的需求、人的价值、人的发展为最终目标;并突出“以人为本”的图书馆发展理念。

研究图书馆转型、着力于图书馆的变革与创新,其意义在于:第一,可以明确现代图书馆的定位和职能,规范图书馆与政府、社会、读者的关系,

有利于图书馆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完善其内部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益以及为国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第二,能够促进图书馆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进一步解放图书馆的生产力,提高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使用效率,吸引社会大众走进图书馆,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第四,现代图书馆能适应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图书馆功能多样化的需要。现代图书馆是满足国民知识、文献信息需求的专业化组织,是国家科教兴国与教育制度化的产物,承担着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遗产与知识信息的任务。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学者关注图书馆的新一轮变革,就图书馆转型问题进行探讨。1997年,第五届全国图书馆馆长联席会议上,徐文伯代表文化部作了题为“加速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的发言。这一讲话标志着图书馆向现代化转型工作开始启动,理论研究也逐步展开。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黄俊贵先生。黄俊贵在与莫少强合著的《试论传统图书馆转型与图书馆体制改革》一文中指出,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以借阅服务为主体的传统图书馆正逐步向以信息服务为主体的现代图书馆转变。图书馆只有顺应社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1998年,黄俊贵在《图书馆的转型与发展散论》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图书馆的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图书馆转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图书馆。图书馆的转型和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办馆效益,并实现可持续和协调发展。2002年,黄俊贵、林汉城在《公共图书馆转型与定位的探索》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两次转型。他指出,第一次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封建藏书楼向对社会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的转型;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今仍在发生的转型。由于这次转型的深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必须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准确定位,这样才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求得更快的发展。

黄宗忠先生对图书馆转型问题也一直给予关注。他在《论图书馆转型期及其任务——走向图书馆新时代》一文中认为,图书馆转型期就是图书馆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共存互补的过程,是从有机融合走向复合图书馆的过程。为了全面理解图书馆转型、把握图书馆转型的任

务及其走向，黄宗忠从三个方面对图书馆转型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一是图书馆转型期的概念、目标和指导思想；二是图书馆转型的成因、形式与特征；三是图书馆转型期的任务与措施。黄先生同时指出，在转型期，传统的图书馆体系仍然是主要的，数字图书馆只能处于补充地位。

张晓林先生另辟蹊径，从图书馆研究入手，在《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并不是独立的社会现象，而是服务于一种更为本质、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的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是一种社会性的工具。这里的更本质、更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人们的情报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报交流活动。图书馆的研究应该从图书馆的组织、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中解放出来，去研究更本质的社会现象。他在《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一文中，试图对图书馆研究作一个新的定位。他指出，在现代信息环境和知识经济的双重冲击下，图书馆的变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范式过渡到另一种范式，从总体来看，图书馆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这样的变化，最根本的还不是图书馆为完善自己的服务而不断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而是图书馆所服务的人们利用信息的环境与方式在变化。因此，他认为，应该建立面向变化和可持续创新的发展管理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2004年，吴慰慈先生在其主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一书中，为“图书馆转型”专门设置了一个章节。在这一章里，安徽大学的桑良至先生从图书馆转型的策略、目标、实施以及图书馆转型后的运作系统四个方面对图书馆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标志着图书馆转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已被学界所公认。

尽管如此，总体来看，学界对图书馆转型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针对目前图书馆转型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应该把图书馆转型作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心之一，以图书馆转型为视角，对图书馆变革的内外环境和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把信息资源的建设、信息用户和服务以及图书馆的管理等纳入到社会变革和图书馆现代化进程的轨道上来。立足现实、面向现代化的图书馆建设是图书馆转型的基本要求。作为信息时代图书馆变化的一种趋势和状态，图书馆学应该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变化的原因、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变革等多角度揭示图书馆转型的规律，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一套能够指导图书馆转型和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体系。

第一章 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 / 1

- 第一节 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的原因 / 1
- 第二节 近代图书馆的形成 / 7
- 第三节 近代图书馆的特点 / 13
- 第四节 近代图书馆制度的建立 / 18
- 第五节 辛亥革命前后近代图书馆的发展 / 21

第二章 现代图书馆转型 / 31

- 第一节 现代图书馆转型的背景 / 31
- 第二节 现代图书馆转型的目标 / 36
- 第三节 现代图书馆转型的措施 / 42
- 第四节 正确处理图书馆转型期的几种关系 / 53

第三章 转型期图书馆业务工作 / 59

- 第一节 图书馆业务体系和工作流程 / 59
- 第二节 图书馆业务工作基本原则 / 62
- 第三节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与整理工作 / 65
- 第四节 图书馆业务工作自动化 / 79
- 第五节 图书馆连续出版物工作 / 85
- 第六节 图书馆古籍工作 / 92

第四章 转型期读者服务工作 / 103

- 第一节 流通服务工作 / 103
- 第二节 参考咨询工作 / 107
- 第三节 延伸服务工作 / 115
- 第四节 社区图书馆 / 120

第五章 转型期图书馆管理工作 / 127

第一节 图书馆管理的对象、特点和内容 / 127

第二节 图书馆管理的模式 / 130

第三节 图书馆统计和业务档案管理 / 135

第四节 图书馆评估工作 / 144

第六章 数字图书馆 / 161

第一节 数字图书馆的概念与功用 / 161

第二节 数字图书馆的主要技术 / 169

第三节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概况 / 171

第四节 数字图书馆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 173

第五节 数字图书馆对馆员素质的新要求 / 176

第六节 对于古籍数字化的思考 / 179

参考文献 / 185

第一章

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

第一节 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型的原因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变化规律。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历程，到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古代藏书楼似乎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逐渐被一种新型事物——图书馆所代替。古代封建藏书楼的衰落以及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战争对封建藏书楼的直接冲击

战争历来是藏书事业的大敌，我国历史上因战火而毁损的书籍和藏书楼不计其数。导致古代藏书楼转型的战争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古代藏书楼的破坏

1840年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连年的战争，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文化事业受到摧残，珍贵典籍大量流失，这直接影响了当时封建藏书楼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动摇了江南地主阶级的藏书楼队伍，加速了封建藏书楼的衰落，同时也推动了我国近代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在反对封建政权的同时，用“拜上帝”来否定封建传统的儒家思想，否认孔子的神圣地位，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就对儒家典籍

采取了一概毁弃的政策。1853年,太平天国官书《诏书盖玺颁行论》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量文物典籍被有意无意地毁坏,如镇江的金山寺被焚,金山寺里的文宗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付之一炬。另外,一些地主阶级士大夫的藏书也遭到焚烧,有些藏书也在辗转中流失了。在太平军一片焚书声中,有史可考的就有25家著名私人藏书楼毁于战火之中。正如《纪闻类编》卷四《焚书论》描述:余生不幸,虽未坑儒,业已焚书。所见者洪逆之乱,所至之地,倘遇书籍,不投之于溷厕,即置于水火。遂使东南藏书之家,荡然无存。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后,开科取士,并派曾钊扬、何震川、卢贤拔等做删改儒家经典的工作,陆续刊布了改定后的《四书》、《五经》,并在天京设立镌刻营和删书衙,出版图书。出版的图书中以《天朝田亩制度》影响最大。《天朝田亩制度》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地反对封建制度的意义,其他还有《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等出版物,起到了统一文化思想的作用,反映了太平天国内政的重大建设。

(二) 帝国主义入侵对清朝藏书的毁坏

在中英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入侵宁波后,掠去天一阁藏书楼的《大明一统志》等珍贵舆地^[1]类书籍数十种,并从这些图书中搜集中国地理及江河概况等方面的情报资料,为其日后闯入长江、入侵中原作准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9月下旬攻至北京城外,在北京进行了极其野蛮的抢劫行径。京城西北郊的圆明园中大量的古物古器惨遭破坏。园中的《四库全书》被焚、《永乐大典》惨遭洗劫。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再遭浩劫,大量珍贵古籍文献或被焚烧,或被掠夺,或散佚于民间。

二、改良主义者对图书馆发展的倡导和推动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门户后,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疯狂。清政府腐败无能,更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深感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于是,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大力提倡变法富强,强调“启迪民智”,进而振兴中华。随着西方自然

[1] 舆地:相当于现在的地图。

科学的介绍,以及社会科学的传入中国,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的设施较早地为改良主义者所注意。他们主张设立公共藏书楼,改变封建藏书楼的经营作风。当时出现的学会、学堂、报社、译书局等,几乎都附设有藏书楼,从而促进了近代图书馆的兴起。

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注意到西方图书馆的人,是清末近代化的先驱——林则徐、陈逢衡、姚莹、徐继畲等。他们四人从1841年到1848年陆续撰译出版了《英吉利纪略》、《康卫纪行》、《瀛环志略》等著作,其中都先后提到了英美各地的大图书馆、经典馆、藏书楼等,并列出了各馆的藏书数字。此后,一些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较早的改良主义者,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育(包括图书馆)事业的同时,提出了改革我国文化教育的主张。例如,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都反映了他们对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和学术职能的看法,也提出了中国政府应办公共藏书楼,以推动文化事业、启迪民智的建议。

具体来说,早期改良主义者关于图书馆的言论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救国必先治学,治学必创设藏书楼。改良主义者遍游各国,接触外国资本主义文化较多,比较清楚文化教育的社会作用。因而,他们对西方文化教育者关于社会制度和学说的介绍颇有兴趣,认为图书馆应该公开藏书、提供借阅,以供文化教育者参考。

(2) 总结封建藏书楼的得失,强调公共藏书楼的作用。藏书可以洗涤人心、启迪民智、复兴中华,但当时中国只有封建藏书楼,没有公共图书馆。改良主义者在比较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得失后,进一步指出了封建藏书楼的局限,鼓励人们把藏书公开,或集资共同建设图书馆。这种揭私藏之弊病、示公藏之利益的观点,在学术文化要求比较迫切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切中时弊的效果。

(3) 介绍西方图书馆事业,倡议兴建公共藏书楼。基于文化教育救国的思想,郑观应等人对西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技术进行了热情的介绍。他们对西方各国京都图书馆及其藏书作了详细报道,借此对比说明中国的图书馆数量少、图书不能成为社会财富,从而激发人们学习西方、建设藏书楼、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热情。对于外国图书馆技术,他们则着重于介绍外国图书馆借阅制度简便、方便读者利用的措施。这些宣传,对于封建藏书楼封闭僵

化、重藏轻用的做法给予了一定的冲击。

三、封建经济的解体导致封建藏书楼的衰落

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开了大门，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批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逐渐出现；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得一些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得以形成；由于战争频繁，农村中的地主阶级有些破产了，已无力维持藏书楼的局面，而逐步把藏书典当出卖。这些新的变化，使封建藏书楼的藏书逐渐转向城市，成为新的商品。封建地主官僚单独占有图书的情况因此有了改变。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记述了他接触的部分藏书家变卖藏书的情况，其中有乡村地主，也有官僚大户，他指出这些收藏家不断出售历年所藏的主要原因是：①家道中落者，以书抵债，或卖书以供挥霍；②仕途失意，以书变卖充公或祈求盘缠；③藏书散出以转向工商业资本。

四、近代西方图书馆思想的输入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与古代藏书楼不同的西方新式图书馆理念。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父子合著的《外国史略》就介绍了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的藏书和图书馆情况。同一时期，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理哲所著的《地球史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意大利、法国、德国的藏书和图书馆情况。美国传教士高理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英国传教士戴德江的《地理志略》和英国传教士莫维廉的《地球全志》，分别对欧美各国的图书馆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随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藏书楼和图书馆。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也随之而来。西方列强文化先锋——西方传教士们，想通过思想文化这个阵地来征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他们在中国大办教会学校、医院和报馆。在出版发行书刊的同时，也开办教会图书馆，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藏书家们瞠目结舌的新式图书馆。其中，著名的有北堂图书馆、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亚洲文会中国支会图书馆、格致书院藏书楼、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等。

西方人在北京、上海和武昌等地设立的图书馆，尽管规模有限，但它们从图书的收集、组织到图书馆的管理与利用等方面，都采用了西方先进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树立了范式和榜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藏书楼传统思想及服务理念的变革与创新。

五、藏书家藏书理念的逐步改变

历经多年的积累，到近代，我国社会逐步出现了藏书宏富的几个大藏书家。当时比较著名的藏书楼中，浙江陆心源的“皕宋楼”、丁丙的“八千卷楼”、山东杨氏父子的“海源阁”、江苏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被称为清末的四大藏书楼。陆心源，字刚甫，号存斋，浙江归安人。陆氏对古书情有独钟，并喜欢收藏，见到喜欢的、特别珍贵的古籍，一定会倾其所有来购买。他一生共建藏书处3所，总藏书量达15万卷，其中有影响的为“皕宋楼”和“十万卷楼”。“皕宋楼”意思是指该藏书楼收藏有两百部宋元时期的珍贵古籍。而“十万卷楼”收藏明代以后的秘刻、名人手稿、手抄本以及近代人著述。陆心源本人著书940余卷，名曰《潜园总集》。丁丙，字嘉鱼，号松生，浙江钱塘人。他的父亲和哥哥（丁申）都喜欢古书。丁申、丁丙兄弟二人，在清同治年间曾有“双丁”之称。他们兴建的“八千卷楼”的藏书中，共有宋元刻本140余种，明刻精本、旧抄善本及著述稿本、校讎本约2 000余种，另外还有文澜阁著录之书3 500余部。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特色明显，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多为《四库全书》的底本；其二是多为日本等国的刊本；其三是多为名儒宿学所校；其四则为近代校勘家、收藏家所藏之书。“八千卷楼”的藏书，以后全部归属江南图书馆，即今天的南京图书馆。

清光绪年间杨以增的“海源阁”藏书也很有影响。杨以增，山东聊城人，任江南河道总督时，收藏了汪士钊艺芸书舍的书。汪氏所藏的书主要是从黄丕烈“百宋一廬”那里得来的，同时又收购了明清时期毛晋、钱曾及乾隆嘉庆时期部分藏书家的精华。因此，杨以增的藏书实际上涵盖了南方藏书家的精华，改变了当时私家藏书以江浙为中心的局面。杨以增之子杨绍和在京做官时，又收集了清皇族怡府藏书，成为近代藏书史上的“北杨”。“海源阁”所收藏的大部分宋、元珍本，于1927年经杨敬夫移藏天津。1929年、1930年

聊城经历了两次兵火,“海源阁”藏书损失很大,所藏明、清版本后来移到济南杨氏新居。1931年,杨家曾经把宋、元珍本若干种抵押给天津某私人银行,后又辗转到北京图书馆。“海源阁”后人杨凤阿把藏书归入祖祠,供族人共同使用。

同一时代的南方,有江苏常熟的瞿氏藏书,即所谓的“南瞿”。瞿绍基,早年酷爱藏书,积累数万卷,室名“恬裕斋”。瞿绍基的儿子瞿镛,更热衷于搜集古本旧藏,并幸运地得到了张海鹏爱日精庐、陈揆稽瑞楼及苏州等地藏书家流散到社会上的书。瞿镛的儿子秉渊、秉清,同样喜欢藏书。当时江浙一带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藏书大量散出,瞿秉渊兄弟除妥善保藏家中图书外,还广泛访求各地秘本图籍,使藏书数量和质量都得以大大提高。1874年,“恬裕斋”改称“敦裕堂”,而后再改名“铁琴铜剑楼”。1898年,瞿氏后人瞿启甲将藏书楼发展至仅宋元珍本就达200多种。此外,瞿启甲还编印了《铁琴铜剑楼书影》,辑印部分珍藏本书,以供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铁琴铜剑楼传至瞿启甲时,藏书欢迎阅读。凡到该楼的读者,不论济览、校勘、转抄、参观,主人都表示欢迎。

与此同时,在近代社会的逐步变革中,一部分读书人迫切要求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时局和世界发展状况等,但由于经费问题而不能大量购置图书,要求公开私藏书的呼声越来越高。一部分藏书家因战祸连年、生活无定、收藏困难,而把藏书寄放到公众场所,以图永久保存。于是,在19世纪后半叶,珍藏秘籍公开和半公开的现象越来越明显。除上面提到的大藏书家之外,最典型的是光绪年间吉林的国英在北京创办的“共读楼”。国英利用做官得来的余财,购置藏书两万余卷,公开借阅。其读楼设检事一人,管理并代查书籍;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定为每年三月至十二月,每月逢三、八开楼。会试期间,天天开放。借阅方法为先领取图书条,凭条借收,就室阅览,每次只能查阅一二种。这些制度和方法已具有明显的近代公共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的典型特征。

总之,藏书高度集中于数家,聚散迭兴,部分流失国外,部分转入以后的公立图书馆。这些现象都表明,在封建藏书楼逐步衰落的过程中,正孕育着向社会公开的趋势,这种趋势为近代图书馆的出现创造了时代背景。

第二节 近代图书馆的形成

一、相关法规条例的颁布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晚清和国民政府关于图书馆的一系列法规条例的颁布，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维新派人士梁启超和清朝皖省的何熙年、浙江的张亨嘉、杭州的徐树兰等开明绅士创办了近代藏书楼公开藏书的实践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其他一些省份的官员也很快意识到，创办公开的近代图书馆是造福民众的好事。他们纷纷奏请朝廷，批准他们筹建公共图书馆的要求。自1904年我国第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创立之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形势十分喜人。据《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记载，1901—1911年间，正在和已经开办的各类图书馆有40多所，包括公共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1所、省级图书馆17所、市县级图书馆4所。为了让中国近代图书馆这一新生机构有规可依、有序发展，清政府学部于宣统二年（1910年）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该奏折指出：京师图书馆业经臣部奏明开办，各省图书馆亦须依限于宣统二年（1910年）一律设立。臣等伏查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创办伊始，头绪纷繁，非有整齐划一之规，末由植韧基而裨文治。臣等悉心斟酌，拟订章程二十条。该章程对图书馆宗旨、建制、设置、名称、管理规范、藏书结构、服务内容和方式、经费来源等作了全面而明确的规定，是我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图书馆的法规。从此，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有了法律的指导与保障。

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确定由当时的教育部门主管全国的图书馆事业，颁布了图书馆的法规。当时的教育部门于1915年先后颁布了《图书馆规程》和《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规程》规定：各省、各特别区域应设立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阅读。《通俗图书馆规程》规定：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储集各种通俗图书，供公众阅览。在两个《规程》的指导下，公共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当时相关资料统计，1930年，全国有图书馆1 468所，1931年有1 620所。1935年，数量达2 935所。据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48年）统计，1936年全国共有图书馆5 196所。这一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尤为迅速，1925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